

《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康熙形象

——兼与同时期欧洲语境中的康熙形象比较

[中] 刘广铭*

目次

- 一、金昌业与《老稼斋燕行日记》
- 二、《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康熙形象
- 三、结束语

一、金昌业与《老稼斋燕行日记》

《老稼斋燕行日记》是朝鲜朝士人金昌业出使清朝后所著的游记文学杰作。

金昌业（1658—1721），字大有，号老稼斋，郡望朝鲜安东金氏。其家族是累世簪纓的名门望族，且以节操高尚，学问渊博名于当世。金昌业所生活的朝鲜朝中期，朝局板荡，党争不已。安东金氏于其时一门显贵，独昌业无意仕途，一心想往放浪山水。1689年，朝局遽变，“己巳换局”发生，昌业时年31，历此变故，犹觉宦途多舛，遂决意“废举务农”，“寄情松菊也”。

1712年，昌业长兄昌集以冬至兼谢恩正使赴清，昌业以“子弟军官”随行。游记文学杰作《老稼斋燕行日记》就是昌业此次中国之行的鲜活记录，其中对当时清朝的统治者康熙多有描述，笔者拟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之方法分析其中的康熙形象，并与同时期欧洲语境中的康熙形象比较，进而阐明“社会集体想象”有多么坚实牢固，而挣脱其桎梏又是何其曲折艰难。

* 中國洛陽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gm8696@126.com

二、《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康熙形象

后世史家謂康熙一生，“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那麼，老稼齋眼裡的康熙是什麼樣子呢？讓我們先從老稼齋之前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之描述說起。

1) 康熙皇帝的肖像

1669年，閔鼎重做為朝鮮正使率使團出使清朝。此時，康熙應是15歲左右的少年。閔鼎重在其《老峯燕行日記》中將他所見到的康熙做了如下描述：“清主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其出入輒於黃屋中回望我國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而老稼齋描繪的康熙形象則是：“皇帝向西盤膝而坐，廣額，頤稍殺，髯犯頰而斑白，雌雄眼，神氣清明。其衣帽皆黑，與凡胡無異”。¹⁾

1669年距1636年清軍第二次入侵朝鮮，並與之簽訂城下之盟去之不久，在閔鼎重的記憶中，這段慘痛的民族歷史可謂記憶猶新。因此，閔鼎重筆下的康熙基本上是一個刻薄、暴戾的形象。描述者對其充滿了憎惡與厭煩的感情。實際上康熙長得並不至於象閔鼎重所描述的那樣難看。據《清聖祖實錄》：“上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准岳立，耳大聲洪，徇奇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這是滿族人自己描繪的康熙形象。無庸贅言，其真實程度究竟有多少，是頗值得商榷的，估且將它算作另一種誇張的描寫吧。康熙自己曾說：“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這應該是一句老實話。對比閔鼎重與老稼齋對康熙的描述，後者顯然較前者賦予了這一形象一定的正面因素，但時隔40余年，這一形象卻依然沒有完全脫却暴戾的一面。

康熙的形象果真如此嗎？讓我們看看當時相對客觀的歐洲人是如何描述康熙的。

1)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P98。

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多次接触了康熙之后，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报告中写道：“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²⁾另一法国人，耶稣会士李明亦曾这样描绘康熙的风度：“据我所见，皇帝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称姿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蔼，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象是位君主，一见便引入注目”。³⁾而“关于今日君临中国的皇帝之人品，派往北京宫廷的荷兰的最后一个使节，在其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今日君临于中国的鞑靼族君主，年近五十岁，身材魁伟，黑黑的大眼睛，鼻子稍高，黑色的连鬃胡须很厚密，几乎没有下髯，脸上有点痘痕，普通身材’”。⁴⁾于1692年—1695年奉沙皇彼得一世之命率使团出使清朝的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台斯自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在西欧发表的出使笔记，对康熙之肖像亦作了细致的描绘：“博克达汗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⁵⁾

仔细对比朝鲜人与欧洲人塑造的康熙形象，闵鼎重的描写是最具负面色彩的，老稼斋则正面色彩与负面色彩兼而有之，而欧洲人则倾向于正面描写。康熙自1662年承继大统，至老稼斋出使中国的1712年，时间已历50年。这期间，清王朝正逐步将中国引向繁荣。至康熙中叶以后，清朝已经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另外，清朝统治者有意对朝鲜采取了“抚藩字小”方针，在许多方面给予朝鲜格外的体恤，朝鲜人“反清复明”的意识已不及从前鲜明，老稼斋对康熙形象的描述正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在一般朝鲜士人身上的反映。而白晋等欧洲人，身负传教及向东方殖民的双重使命，他们将康熙塑造成一个理想化的帝王形象

2)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P196。

3)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P84。

4)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P84。

5)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P213。

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现实的利益需要使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异域文化的相异性，对康熙采取迎合的态度，以换取最大的实际利益，因此，他们的评价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二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欧洲国家最主要的文化源头之一是古希腊文化，即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冒险、开拓、崇尚武力以及强者。这恐怕是白晋等欧洲人理想化康熙形象的深层原因。

2. 围猎讲武之康熙皇帝

老稼斋以前的燕行录往往将康熙描绘成一个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佚名《燕中闻见·II》中的描述就是如此：

“概闻皇帝虽无虐政暴举，荒淫成性，盘游无节。姑以近事言之，夏间幸沈之时，不由修治正路，驰马射猎，上下山坂。及到辽东太子河，设打鱼之戏。皇帝身着拒水裤袜，戴小帽，入水叉鱼，应手辄获。大臣明珠及诸王以下皆令执罟，沾体涂足丧失威仪。近处军民许其饱观，不使拘呵。且称皇帝能炮善射，每当游猎，勇前当兽，发即命中云。可见其自轻无度之实矣”。⁶⁾

“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⁷⁾朝鲜使臣言说康熙举动轻佻，意在申明自己行止之端肃。

对佚名所描述的康熙之行为动止，曾随侍过康熙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其《鞞鞞旅行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皇帝自身为了狩猎，常离开大道，在稀有人踪的山中，开辟小道前进，就是和后妃们一道前进时，他为了不损坏大道，也带着他那一队人马，离开大道前进……他为了让任何人都能看见自己，如同在北京的惯例一般，禁令卫兵们，不准不让百姓靠近”。⁸⁾

佚名的燕行录对康熙的描述非常鲜活，将康熙写成了一个威仪尽失，行为

6)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P283。

7)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124。

8)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P76。

荒唐的小丑形象，根本没有君临万方的帝王气派。而比利时人则怀着仰慕的心情，将康熙塑造成了一个理想化的君主形象。这个时候的清朝入关才30余年，兵燹之后，百业待兴，大局初定，立足未稳。朝鲜上下“反清复明”之呼声甚高，朝鲜君臣确信“胡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寄望于中国的内乱，寄望于执政者的不理国事自掘坟墓，因此才有了这般描述，实际上这样的描述带有浓厚的主观情绪，与事实出入很大，在某种程度上是《燕中闻见·Ⅱ》之作者一厢情愿的反映。至老稼斋时，金昌业已经能够对康熙的观鱼、游猎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当其他燕行使者对康熙常在相对偏僻的畅春园处理朝政百思莫解时，金昌业如此写道：

“盖胡人以马上为家，能耐饥寒，其长技也。入中国70年，居处饮食渐奢侈，失其本色，以故使之朝夕往来以习其驱驰，不设其所居以警其安逸，其意可谓深远。其避暑于热河，观渔于霸州者，亦非徒为巡游也”。⁹⁾

老稼斋已经不再把康熙的“观鱼”、“避暑”仅仅当作是一种安逸的休闲活动，而是明确意识到了它的演兵讲武性质。不仅如此，老稼斋对康熙与部下同甘共苦的作风亦是持欣赏态度的。“曾闻朴得仁从皇帝往征阿鲁德，遂问其时事，得仁曰：阿鲁德乃蒙古种，而所居绝远，皇帝选精骑亲征，舍辎重，日夜兼行……战士二十余日所食，通不过数升糜，而皇帝不食者亦六、七日云”。¹⁰⁾这样的描述是相对客观的，已经少有先入为主的成份，同康熙本人的自陈及来自其他各种途径的说法亦较为一致。据《清史编年》：“帝谓议政大臣等曰：‘朕自幼时读书之余，常习骑射，因见满洲中挽硬弓者甚少，常以骑射鼓舞众人。朕自幼常习畋猎，身体强健，中路出征时，往来行走四月有余，日进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清昭槎之《啸亭杂录·卷一·爱惜满洲士卒》对康熙的体恤兵勇亦有所载：“国初自定中原后，复遭三逆之乱，故八旗士卒，多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丁口稀少。上尝恍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获一满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当时时加赏恤，至为之代偿债务，凡抚字之术，无不备

9)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P121。

10)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P104。

施。虽一时不无滥用，而满洲士卒感戴如天，凡征讨之所，争先致死焉。”¹¹⁾

清朝以弧矢定天下，当年满族先人，崛起于白山黑水，靠的就是骑射这一根本。康熙不废祖制，常借东巡之机围猎以讲武事，其打鱼行围只是手段，演习骑射，保持八旗劲旅的战斗力的，才是其真实目的。而老稼斋能不为“成见”所囿，对康熙之打鱼行围有一个全新的“阐释”，不再寄望于满洲皇帝因“游戏无度”而自取灭亡，实属难能可贵。老稼斋不但破除成见，对满族人的围猎讲武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且还对自己民族的骑射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为自己民族的骑射技不如人而羞愧难当：

“蝦（按，指侍卫）曰，皇帝要见朝鲜善射人，遣俺迎来，仍问行中有能诗善写者否……答以俱无。又问有能摔跤者否，亦以无答之”。¹²⁾

面对满族人的夸耀武力，老稼斋敢怒而不敢言。并为自己的国家党争不断，国事日非，积贫积弱，武备松弛而感到难过。更为自己空怀一身“修齐治平”的抱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悒郁苦闷。

对于康熙的崇尚武功，同时期的法国人白晋亦有生动的描述：

“无论徒步或骑马，立定射击或快跑射击，他都能左右开弓。箭射飞禽走兽，很少虚发。各种武器，包括人们现在已不再使用的，他都件件精通。他应用我们的火器如同自己的弓和弩机一样。尽管鞑靼人生来善于骑马，但康熙皇帝在他们之中还是个杰出的骑手。他姿势优美，骑术高超，平地陡坡，上下自如”。¹³⁾

来自“普罗旺斯抒情诗”故乡的法国人，以一种欣赏的态度，将康熙描绘成了一位优雅而潇洒的骑士。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是个固定的阶层，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极大地提高了骑士阶层的社會声誉与政治地位，并在同东方文化的接触中，逐步形成了“忠君、护教、行侠、尚武”的骑士信条。受这种先在经验制约，我们在法国人的笔下，找不见任何朝鲜使臣描述康熙的流风余绪。

11) 昭槎，《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P6。

12)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P98。

13) (法)白晋，《康熙帝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1980，P197。

3) 节俭惜财之康熙皇帝

帝王俭侈，事矣国之兴衰，历史殷鉴可寻。康熙亲政后，披览典籍，颇有会心。康熙的节俭自然引起了老稼斋之注意。到中国后，老稼斋所耳闻目见的，都是康熙朴素节俭的一面，这与他赴清之前所得到的间接经验可谓南辕北辙：

“旧闻皇帝于畅春园作离宫十五处，貯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宫室制度及衣服饮食器皿皆从其地风俗，而皇帝沉湎其中。今来见之，与所闻大异，畅春园南北二百余步，东西百余步，岂容置十五处离宫乎？……且观其门与墙，制度朴野，无异村庄……窃意此处与西山玉泉相近，山水之景，田野之趣兼焉，似爱此而来尔。以此观之，其人性稟可概也……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贸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¹⁴⁾

“宜矣”！老稼斋对康熙惜墨如金的这个赞美，是发自肺腑的。由康熙雅好“山水之景，田野之趣”推知他“性稟可概”，大有高山流水，惺惺相惜的味道。老稼斋长期归隐，好桑麻之乐，在乡村恬淡自喜，五柳自喻，他或许由畅春园的景致联想到康熙亦有同自己一般的散淡情怀吧。

老稼斋的这种矛盾心态，正反映了他在“社会集体想象”与“个人体验”之间的摇摆。朝鲜朝作为一个阐释集体对满清的认识具有一致性，但具体到经验个体，又在这种一致性里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来，而这也正是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形象之丰富性所在。

(康熙52年) 3月“丁未，谢恩兼冬至使金昌集、尹趾仁、书状官卢世夏复命。上引见，慰谕之。问彼中事，昌集等对以清皇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¹⁵⁾从这份使行归国后递呈国王的报告看，老稼斋与其兄昌集等人在节俭与浪费这一点上对康熙的看法是一致的。然而就在一年前，即康熙51年的7月，“丁未，谢恩使朴弼成、闵镇远、柳述入来……曰：‘彼皇贪财好货，拜官皆以賂得，商贾之润屋者，辄授职级。民不聊生，怨声载

14)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P121。

15)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P4314。

路。往来馆中者，无不斥言如是矣”。¹⁶⁾相隔仅半年余，两次使行得出的结论出入竟如此之大，甚至是完全相左，这里面有诸多复杂的原因，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这一角度来说，有一点启示是肯定的，即：一国文化中关于异国形象的表述，重要的不是复制一个经验事实，而是发掘其可资利用的价值，采他山之石以攻玉，应该说这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潜在动机。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经验个体虽受制于共同的“社会集体想象”，然而在对同一具体的认知对象作出阐释时，依然会不同程度地背离先在的“社会集体想象”，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勇气来。如果换作不同文化背景，对同一具体的认知对象的阐释其差异性将更大。现代阐释学告诉我们，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理解难免误解，先在的民族文化心理与经验结构作为先在视野，总是制约着阐释者的理解与阐释活动。这说明，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能否重现真实或许并不重要，而且也难以企及，重要的是文化的互为利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就在老稼斋为如何描述自己所理解的康熙而彷徨于“社会集体想象”与“个人体验”之间时，法国人白晋则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他喜爱简朴，甚至在他的衣着和他的一切生活用品上都能看得到。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里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最常见、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丝绸服装”。¹⁷⁾

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在其笔记里对康熙的衣着亦有类似的描述：

“皇帝穿着深底花纹绸缎的普通长袍和深蓝缎子的银鼠皮褂子。由颈至胸挂着用大珠子串成的朝珠或念珠。头戴貂皮镶边暖帽，帽上垂着红丝帽缨，向后垂着几根孔雀翎。皇帝的头发梳成辮子垂在背上。他身上没有佩带金饰物和宝石”。¹⁸⁾

法国人白晋之所以将康熙描绘成一位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除了现实利益的

16)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P4302。

17) (法)白晋，《康熙帝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1980，P211。

18)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P213。

驱使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恐怕同样是欧洲关于中国的“社会集体想像”制约的结果。马可·波罗时代之前，欧洲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只不过这些传说虚无缥缈、难以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其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就是中国。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公元1298年）算起，那么至白晋1697年向法王路易十四递呈秘密报告，则欧洲关于中国的形象史刚好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里，欧洲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及文本性，因为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关于东方的游记中，《马可·波罗游记》实在是影响最大的一篇。它是最让欧洲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马可·波罗游记》创造了欧洲集体记忆中的东方形象。其形象特征主要表述为：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尤其是繁荣富庶，是欧洲人视野中的东方形象最有魅力的成份，几乎达到了传奇的程度。

法国人在描述17世纪末的中国形象时，完全没有脱离“社会集体想像”的制约，依然将中国表述为繁荣富庶的形象，但在描述康熙形象时，则一反传统，依据自身的“个性体验”，并通过与历史文本的对话，拓展了自己的视野，改造和发展了传统的“社会集体想像”，将康熙塑造成了一位带着传统的影子，又在某些方面出乎传统的形象，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并融入欧洲关于中国之想象的记忆当中去，使之成为“有效应的历史”之一部分。而在这一点上，老稼斋与法国人的工作同样出色。所不同的是，老稼斋背负的传统更加沉重，而他所迈出的脚步亦更加艰难。他想凭借自己所耳闻目见的实际经验表述出一个“理想化”的康熙，但又无法完全摆脱“社会集体想像”对他的制约，这种矛盾的心态，使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一个“老稼斋化”的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康熙形象。

三、结束语

在朝鲜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满族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燕行录中的康熙形象实际

上是朝鮮人對於滿族人數百年歷史中無數次典型經驗的積淀和濃縮。其中有一些客觀的知識，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領域中，都是那些產生自獨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朝鮮人正是根據儒家精神或文化傳統中關於“華夷之辯”的“宏大敘事”來規畫同滿族人的關係並進而“理解”或“闡釋”滿族人形象的。這種關於滿族人的文化原型是一種具有深刻滲透力與消解力的普遍模式，任何關於滿族人的外部知識都必須經過它的審視與重構，並與朝鮮人所有關於滿族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相呼應，從而成為能被朝鮮人所認可與接受的滿族形象。對於朝鮮人來說，滿族形象這一在長期歷史積淀中形成的異域經驗模式，已經足以使任何滿族的“事實”本身失去自足性，必須在朝鮮人既定的原型框架中獲得改造與重構，以充分朝鮮化的形象，來滋養朝鮮人的想象以及他們對滿族人的理解系統。滿族，這個飄浮在夢幻與現實間的“他者”或“異域經驗”，只有在為朝鮮朝文化提供某種參照時，才能為朝鮮人所接受。

参考文献

- 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 首尔,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9.
- 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 首尔, 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2001.
-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法) 白晋, 《康熙帝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清史资料》, 1980.
- (荷)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 (德) 亚当·勃兰德, 《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昭槎, 《啸亭杂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Abstract>

Emperor KangXi's Image in "the Diary of LaoJiazhai's Life in Peking"
-A Comparison with Emperor Kangxi's Image in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 Context

Liu-Guangm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ishing time of "the Diary of Laojiazhai's Life in Peking", there are two basic but distinguishing approaches, monsterization and idealization, to the depiction of Emperor Kangxi's image in the Korean serial books about their journey to Peking. Different from monsterization and idealization, Kangxi's image in "the Diary of LaoJiazhai's Life in Peking" is between them and appears to be a tendency of complication. Laojiazhai's creation of the Kangxi's image is mixed with a "pre-understanding" of Manchu and Kangxi. Due to the author's outstanding skill in depicting Emperor Kangxi's image, his creation and depiction has become one integrated part of the "effective history" and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those following creations of Emperor Kangxi's image.

Key Words : Laojiazhai, Emperor Kangxi, Monsterization, Idealization

투 고 일 : 2010. 1. 10. / 심 사 일 :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2. 15.
